

观点速览

书香润古建 文化焕新彩

近日,“旧书新知·读书报国”古旧书市在北京报国寺三殿平台正式启幕。本届报国寺古旧书市汇聚了近百家中外展商、300余个特色展位,集中呈现逾万册古籍文献珍品,其中不乏宋元明清历代典籍善本及孤本秘藏,吸引了众多古旧书籍爱好者“寻宝”。

“旧书新知”是北京著名的文化品牌,这次“旧书+古建”的组合,又为广大读者带来了新体验。古建是凝固的历史,旧书是流传的文化,二者不仅在基因上互配,又在视觉上相得益彰,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氛围。

“旧书+古建”带来的不只是文化增量,还有“旧旧得新”的别样活力。3000多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为北京留下了大量文物古迹。其中很多就在寻常的胡同街巷里,但保护却是“铁将军把门”。从实践经验来看,合理的开发利用,往往能让古建焕发新生,“书香北京”建设恰好为其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就拿万松老人塔和环绕它的小院来说,这里一度大门紧闭,砖谈空间的诞生为小院带来新的生机。古塔赋予这个空间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悠悠书香也为古塔增添了更多魅力,慕名前来者络绎不绝。看“小院终于找到了最契合的来客”。

书是文化的支点,也撬动着城市文化建设的新可能。近两年,地坛书市爆火,联动附近的雍和宫、孔庙、国子监、五道营胡同,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围绕书市来一场City Walk(城市漫步)。再结合“旧书+古建”的探索,我们不难发现,“图书+”的想象空间还很大。充分结合北京丰厚且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转型升级,城市文化建设就能事半功倍。

(3月18日 《人民日报》 晁星)

让文化原创力竞相奔涌

文化原创力源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和彰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对自身文化有深刻的认知、高度的信心,才能获得坚持坚守的定力,鼓起奋发进取的勇气,焕发新创造活力。

任何创造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每个时代富于原创力的要素,总要 to 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去捕捉。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我们必须将文化创造融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嵌入改革发展的时代洪流中,致广大而尽精微,持续汲取原创力量。

文化原创力往往在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的交流碰撞中生长,离不开创作者的理想与追求、情怀与魄力、灵感与创意,也离不开良好的文化生态和社会环境。要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构建有利于原创成果不断涌现的体制机制。要大力弘扬创新精神,把资源、资金、奖项等向原创作品倾斜,引导创作者排除资本、流量逻辑的干扰,克服模仿克隆、题材扎堆、内容同质化的倾向,以执着的追求向着文化发展的最前沿砥砺前行。要大力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让文化创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我们要积极拥抱、善于用好,推动其在文化创作设计、内容生产、传播体验等环节的赋能应用。

(3月20日 中国新闻网 谭一鸣)

以开放包容的态度看待文学体裁

在广袤的文学天地中,体裁犹如一道道纵横交错的经纬线,试图编织出不同的文学样式轮廓。然而,文学究竟需不需要体裁这一问题,却引发着诸多思考与争论。从铁凝对散文范式的批判以及众多文学现象来看,文学体裁既有着存在的意义,又在时代的浪潮中面临着挑战与突破。

当我们深入观察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会发现体裁的界限并非坚不可摧。散文本应是自由表达的天地,鲁迅说:“散文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像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小说刊物与散文刊物都进行了转载,这表明文学体裁的边界在优秀作品面前被模糊和消解了,读者关注的更多是作品本身的魅力,而非它属于何种体裁。

文学创作的主体也不应被体裁所束缚。只写散文的散文家,其作品可能会显得孱弱无力。文学没有边界,没有规定散文只能由散文家来写。许多跨领域的创作者,凭借其独特的生活体验和多元的知识背景,打破了体裁的限制,创作出了别具一格的作品。例如一些科学家、画家、音乐家,他们从自己的专业视角出发,用文学的笔触表达对世界的理解,为文学带来了全新的元素和视角。

在未来的文学发展中,或许我们应该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看待体裁,鼓励创作者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大胆突破,让文学的百花园绽放出更加绚烂多彩的花朵。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发展,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精神需求,成为人类思想和情感交流永恒的桥梁。

(3月18日 红网 胡建华)

传统媒体如何创新非遗传播方式

——以《山西经济日报》新媒体非遗传播为例

□栗美霞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保护与传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作为我国民族文化中的一颗明珠,它承载了前人的智慧、技艺和感情记忆,也是我国文化多样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本文以《山西经济日报》新媒体平台在非遗传播中的实践为例,分析传统媒体如何通过内容创新、平台融合与技术赋能等提升非遗传播效能,为同类媒体转型提供参考。

融合转型是非遗传播的必然选择

非遗具有活态属性,它涵盖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在不断的实践互动创造中保护、传承和弘扬。因此,提升非遗传播效果不仅要在形式上注重转化,还要在内容上更多地传播非遗的内涵、价值标准和审美风范,从而促进非遗多层次、多渠道传播,非遗保护才能可持续、有效地开展下去。

传统媒体通过其广泛的受众基础和强大的传播能力,能够将非遗知识普及到更广泛的人群中,提高公众对非遗的认知度和关注度,使非遗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比如,中央电视台打造的常态电视节目《非遗中国行》通过专业的电视影像记录手段,将多地的非遗项目数字化,并全部录入文化和旅游部非遗保护中心非遗数据影像库,为非遗留下了宝贵的数字化资料。

当前,传统媒体在提升非遗影响力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资源。比如,制作高质量非遗访谈节目等,全面展示非遗的独特魅力和深厚文化底蕴。通过生动讲述和展示,让公众更加直观地了解非遗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利用先进的技术制作手段,如高清拍摄、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为观众提供沉浸式的非遗体验,还融合音乐、舞蹈、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打造丰富多彩的非遗节目,提升观众的观赏体验。

总之,传统媒体为非遗的记录、保存、普及、传播以及融合创新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些县级媒体也通过拍摄非遗纪录片、建立非遗展示体验馆等方式,有力

地推动了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社会共同参与提升非遗传播效果

近年来,《山西经济日报》结合新媒体属性,创作符合受众需求的非遗内容,如短视频、直播、H5互动等。2022年春节期间,《山西经济日报》策划推出的“遇见国潮 乐享非遗”直播活动,邀请非遗传承人做客直播间,一起听他们讲述对传统文化元素的理解与运用,将国潮风融入非遗传统文化后碰撞出的创新火花,以及他们背后的传承故事及创新实践。

为吸引更多年轻人和学生群体关注非遗、了解非遗、走近非遗。2022年“五一”期间,《山西经济日报》策划“非”学不可 你来守“艺”——“感受非遗魅力 学习传统绝活”系列直播活动。此次系列直播活动中,首次将镜头直接对准晋剧、太原莲花落、太原秧歌这些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的传承人,通过线上直播的形式向大家展现并记录这些久负盛名的非遗项目的发展历史、艺术形式和活态传承,聆听其背后的故事,感受三晋非遗的独有魅力。直播中,广大网友随镜头跟着非遗传承人一起学绝活,体验非遗项目的同时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每场直播观看量达30万人次,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各界对非遗及其保护重要性的认识。

2023年9月,《山西经济日报》组织了山西十大非遗主题线路采风活动,选取其中两条主题线路进行深度体验,邀请媒体、普通游客、旅游达人、旅行社代表参加采风活动,进行了沉浸式非遗体验,让采风团的每一位成员更深层次地感受山西非遗的独特魅力,感受非遗的传承离不开千百年来匠人的坚守。山西十大非遗主题线路在山西经济日报微信公众号、山西经济日报客户端、山西经济网、山西经济日报人民号同步推送,并配发山西十大非遗主题线路原创手绘长图,提升主题线路内容的趣味性,营造爆款视觉产品,积极营造社会共同参与、关注和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浓厚氛围。

这些活动的举办,不仅提升了非遗文化的曝光度,还激发公众参与的热情,形

成良好的传播效应,提升了新闻媒体的报道质量和影响力。通过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平台线上互动,传统媒体能够及时了解公众对非遗的看法和需求,为非遗的传播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

构建非遗传播新生态的优化路径

内容创新。在新媒体环境激烈竞争的局面上,“内容为王”仍然是吸引受众的核心。报社等有必要从文化的核心出发,全方位、深层次地加以发掘。在内涵挖掘上,应综合考虑新媒体碎片化、传播迅速、受众偏好多元等特征,精心制作形式多样、内涵丰富、便于传播的作品。

这其中,应用短视频传播非遗的效果较好。通过快节奏剪辑,把繁杂冗长的工艺流程巧妙地凝聚在一起,再配以生动易懂的讲解,可以使本来晦涩的技艺过程直观明了,更容易为大众所理解。此外,通过H5互动、动画和漫画等多种方式,非遗文化也能以更富有活力和趣味性的形式展现给大众,吸引更多的年轻观众对非遗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

平台融合。传统媒体要主动拥抱新媒体平台以形成跨平台传播。目前,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直播平台等新媒体渠道正在快速发展,拥有庞大的用户基础和强大的传播能力。通过和这些平台进行深度合作,传统媒体可以打破其在传播中的局限,极大地拓宽其在文化传播中的领域,从而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在微信和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与非遗文化相关的文章和图片是一种基本而有效的方法。微博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话题性,发布与非遗文化有关的话题能够激发网友的讨论与转发;微信公众号能够借助其丰富的图文内容,对非遗项目进行深入的解读,并通过其分享特性,确保文章在用户的朋友圈中得到广泛的传播。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上,发布非遗技艺的短视频,这些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非常精准,能够使非遗短视频精准地触达目标受众。

互动参与。新媒体所具有的互动性给非遗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传统媒体应该充分利用这一特点,主动引导大众参与到非遗文化传承保护活动中去。组织一

场文化短视频挑战赛或者知识竞赛,不失为一种调动大众参与积极性的良好方式。通过设立吸引人的奖项等方式鼓励网民创作、共享非遗有关内容。短视频挑战赛期间,网友可以施展创意,从各自独特的角度去拍一些非遗技艺、非遗传承人生活等,与大家一起分享他们对于非遗文化的感悟。知识竞赛可以覆盖非遗的历史、技艺特色、传承现状等多个方面的知识,使公众在参与竞赛的过程中,能够深入了解非遗文化。

技术赋能。新媒体技术繁荣发展为非遗文化传播提供有力支撑,传统媒体要积极利用这些技术赋能非遗传播。VR、AR等新媒体技术可以营造出一种身临其境的文化体验场景。例如,可以运用AR技术把非遗元素引入现实场景,提高受众互动性与趣味性。在部分旅游景区中,旅游者可以通过手机AR应用对景区中具体区域进行扫描,从而观看到舞龙舞狮、戏曲表演以及其他虚拟非遗表演与现实场景相融合,给人一种别具一格的感受。此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为非遗文化精准传播提供数据支撑。通过大数据分析能够了解受众年龄分布、地域分布和兴趣偏好,以便针对不同受众群体特征制定个性化非遗传播策略。以太原市作为研究对象,近几年来,该市全面而持续地推进了非遗代表性项目以及传承人的数字化记录和推广工作,前后历时3年。运用现代数字技术对全市非遗代表性项目的图文、声像等元素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数字采集和数字存储,建立数字化档案。基于数字化记录建立了“太原市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非遗二维码资料库”。群众只要扫一扫二维码即可轻松感受到图文、声像等不同表现手法生产的非遗项目所呈现的数字化内容,大大提高非遗文化传播的效率与扩大覆盖面。

综上所述,传统媒体需以“技术为翼、内容为核、用户为本”,在非遗传播中实现从“记录者”到“连接者”的转型。《山西经济日报》的实践表明:通过将非遗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文化符号,传统媒体不仅能重构自身影响力,更能在数字文明时代守护文化根脉,为文化传承注入新动能。

(作者单位:《山西经济日报》社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印前质检工作的优化策略研究

□赵同

作为“三校一读”工作的延续,书稿付印前的最后一道把关,印前质检工作能有效发现前期流程中遗漏的各种问题,通过封面与内文的统一核对,有些稿件的硬伤会在此阶段显现出来。在质检中及时消灭各种稿件问题,是全面提升出版物质量的有效且必要途径。印前质检工作对于保障出版物质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前印前质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抽检而不是全品种质检。目前仍有出版社只对重点书、印量大的项目进行印前质检,而不是对质检品种全覆盖。这就会造成有些小印量、非重点项目书带着错误流入市场。此外,部分出版社由于规模过小,甚至未设立专门的质检岗位。

对印前质检权责认识不清。尽管质检与编辑是相互独立的,隶属于不同的部门,但一些编辑人员对自身职权的界定并不清晰,导致对质检工作的理解存在偏差。从编辑的视角出发,部分编辑对质检工作持有抵触情绪,认为质检工作有故意挑剔且延误生产的嫌疑,因此他们希望质检流程能够加快,并尽量避免被指出稿件错误。然而,一旦成书出现编校问题时,责编又会倒逼质检环节,认为质检工作不到位。还有一部分编辑则表现出依赖心理,认为反正印前会有质检的把关,因而压缩了前期的编加环节,把质量问题都后移到了质检环节,从而对质检工作施加的压力较大,希望找到更多的书稿问题。而从质检人员的角度来看,有的质检人员认为如果工作中没有发现错误,就等于没有完成任务,因此对稿件过度修改,甚至导致大面积改版也时有发生。还有些质检人员因为担心与编辑产生矛盾而对错误得过且过,最终导致错误被遗留至成书阶段。

质检沟通反馈机制不畅通。在当前的质检工作中,沟通反馈工作有脱节现象。一方面,质检人员与编辑人员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沟通渠道,质检的结果能够迅速反馈给编辑,编辑也会对质检意见采纳与否作出回应,并给出合理的解释。另一方

面,质检之后的各下游环节发现的质量问题却未能再及时反馈给质检、编辑或是校对部门,特别是确实属于质检或编校范畴的问题。长此以往,质检人员可能会产生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认为自身工作都已经完成,后续环节与自己无关。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在后续的印制工作、印厂印刷、样书审核,直至读者阅读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暴露出前期工作中遗漏的问题。遗憾的是,目前能够做到整个出版链条闭环管理的案例还不多。而对于这些问题作及时、有效的反馈和总结,质检工作的提升与优化将难以加快。

传统质检方式已无法满足融合发展的需求。不同于传统纸质书,融媒体出版的传播形式和手段更加多元化,包括APP、二维码、有声书、数据库产品等。传统的以纸稿为载体的质检方式已不再适用于新兴的数字产品,而缺少质检环节的产品不可避免会存在诸多质量隐患。此外,现行的传统出版质检标准并不完全适用于融合出版产品。

印前质检工作的优化策略

建立完善的印前质检制度。常言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各出版社都应根据自身的业务特点,制定符合自身业务需求的“印前质检制度”。此制度不仅要求质检部门全员学习并严格按照其执行,也应当让全社编辑学习。

质检品种全覆盖。无论是重点大项目还是普通的小印量图书,都应做到应检尽检,不得跳过任何生产流程。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那些试图通过走“绿色通道”来寻求捷径的书稿,往往更容易出现各种稿件差错。

明确质检标准。各出版社应根据自身业务特点,制定出符合该社产品特点的质检标准,即“质检记录表”。鉴于质检对象是已经通过“三审三校”的付型稿件,原则上是非硬伤类问题不纠错,避免对稿件进行大规模修改。在计错时,必须确保每一项问题都“有章可循,有规可依”。质检过程应公正合理,确保编辑人员能够接受并信服。

明确质检流程。针对不同类型的书稿,质检主管应指派合适的人员进行稿件质检。首先,需重点核查稿件的“门面”部分,包括封面、扉页、版权页等。这部分内容一旦出现错误,不仅容易引起公众关注,而且在差错率计算中会扣除较多分数。其次,需对整部书稿进行细致核对,检查目录、天眉与章节标题是否一致,由于前期编校环节的增删改动甚至动版,极易导致全书不统一的情况出现。此步骤的检查有助于质检人员对稿件的情况有大致地了解,同时也能对稿件质量作出初步判断。最后,对稿件中政治性、逻辑性、编校差错等问题进行全局性把关。完成上述工作后,由质检人员在“质检记录表”中总结归纳、说明情况,并反馈给编辑作统一处理。

建立有效的沟通反馈机制。一个高效的沟通反馈机制对于确保信息的及时和准确传递至关重要,它不仅能够提高工作效率,还能促进协作、减轻误会,是推动工作持续改进的关键工具。在质检工作中,对于每本书稿质检后的情况及问题总结,质检部门应及时反馈给编辑。对于编辑已采纳的修改意见,应及时反馈给质检人员,让其既从中获得辛勤工作的满足感,又能判断出自己的工作思路是否行之有效;而对于编辑未采纳的意见,也应适度告知质检人员,使其事后反思工作的方式方法,以便日后不断完善提高。当成书质检发现内容问题的,甚至是从市场反馈收到的读者意见(来自公众号或其他读者平台),判断确实属于具体的印前质检、校对或编辑工作范畴的,应及时反馈给相关部门,并将具体责任落实到个人,令其及时收纳整理并进行整改和回复,使其持续优化工作思路、深刻反思、总结经验。

加强对融合出版产品的质检探索。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出版物出现的任何错误均存在被媒介加速传播,进而演变为舆情危机的风险。因此,任何形式的融合出版物都需要高质量呈现给读者,质检工作应顺应这一发展趋势,主动介入此领域质检。通过在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检索,与融合出版相关的标准

有《出版物虚拟现实(VR)技术应用要求》,其中有“审校与测试”“质量管理”部分的说明,可以此作为参考进行质检;《出版物二维码应用管理要求》,其中的第五项“二维码的编校、审校要求”明确指出,每个校次和审次都要对二维码进行试用,确保二维码正常可用且关联信息不存在重大问题。为此,应结合本社的业务特点展开质检,且应充分重视产品的测试效果,聚焦产品的流畅度和用户体验感,逐步探索适合本社发展方向的质检之路。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质检工作。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为质检工作的质量提升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同时也为质检工作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径。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人工智能模型在识别错别字、检查上下文一致性、引文核查和事实性错误等方面表现出色,这得益于其强大的语料库支持,纠正此类错误的准确率相对较高,能有效解决质检工作中任务繁重与人力短缺的矛盾。而在语义错误的识别中,仍需更先进的算法,故而质检工作同样依赖于人的创造性思维和理性判断,许多纠错结果仍需要质检人员亲自辨别把关。在可预见的未来,质检领域的人工智能更多是扮演辅助的角色。

各出版社可以根据自身的业务特点和出书特色,开发集多种功能于一身的智能质检系统,利用大量高质量的图书资源作为样本,以核心工具书为标准,持续更新数据库,系统功能应涵盖自动识别文字差错、检测上下文一致性、引文核查等。通过系统的自我学习能力,不断适应质检需求,为质检工作释放更多的产能,为提升质检的工作效率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印前质检对于消除书稿的各种差错、提升图书整体质量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各出版社应充分重视印前质检工作,在融合出版与人工智能这千载难逢的机遇到来之时,顺势而为,为全面筑牢出版物质量防线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为“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贡献更多高质量精品好书。

(作者单位:商务印书馆)